

露丝·帕卡鲁克：妻子、母亲、朋友、社会运动者

露丝·帕卡鲁克是一位格外温暖且才华洋溢的女性。她以一位支持堕胎的无神论者的身分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皈依天主教之后，她将自己奉献于养育家庭以及投入支持生命的社会运动。33岁时，露丝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并于41岁时安详辞世。2025年9月29日，教廷封圣部颁发了「无异议」(nihil obstat) 的命令，批准

露丝·帕卡鲁克的封圣案件展开教区阶段的审理。她目前被尊称为「天主之仆」。

2026年3月12日

这篇关于露丝·帕卡鲁克的简介，出自约翰·科弗代尔的著作与 Podcast 《相遇：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寻找天主》。《相遇》介绍了一些人物侧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圣施礼华所传扬的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您可以在亚马逊或 Scepter Publishers 购买本书完整版。

露丝·帕卡鲁克在哈佛大学期间由无神论皈依基督信仰，并于毕业翌年成为天主教徒。作为七名子女的母亲，她积极参与「生命权」(Right to Life) 运动，并在堂区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同时协助组织主业团的使徒工作。她在34岁时被诊断出罹患乳

癌，但直到七年后的1998年9月，在她41岁辞世前的一个月，仍持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从无神论到天主教：经历福音派信仰之路

露丝于1957年3月19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南橘镇，那是一个位于纽约市郊区的小镇。她本名露丝·伊丽莎白·范库伊。她的父亲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但他并未从事工程实务工作，而是选择在一所职业高中任教，以此作为贡献社会的方式。她的母亲在孩子年幼时留在家中照顾家庭，之后则担任行政秘书。在高中时期，露丝在一个由学生创立并管理的戏剧团体中，制作、导演并参演了许多戏剧与音乐剧。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被选入「全东区合唱团」。她同时也是技艺精湛的钢琴演奏者，并在不同的音乐团体中演奏双簧管、长笛、小提琴和大鼓。露丝亦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曾加入曲棍球校队。童年时期，

她随家人参加长老会教会的礼拜；然而到了青春期，她拒绝了父母较为自由派的基督信仰立场，并成为了一名支持堕胎权的无神论者。

高中最后一年时，露丝曾考虑就读空服员学校，因为「只要微笑，就可以看见全世界。」她还考虑过前往麦吉尔大学，那里有位男孩——她晚年曾形容两人之间是「近乎童话般的恋情」——计划前往就读。在一位当地拉德克利夫学院校友的建议下，她申请了哈佛大学。她无法拒绝哈佛的录取，因为如果拒绝了，「我将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与最优秀的人竞争。」

露丝在在大一表现优异，隔年便获邀担任《空间、时间与运动》课程的助教。大二时，她的指定阅读包含布拉德福德总督记述清教徒如何熬过在美洲第一个严冬的经历。殖民地爆发瘟疫期间，他们相互照护所展现的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令她深受震撼，更与

自己享乐主义、自我中心的生命状态形成强烈对比。「我要活得像他们一样，」她暗自思忖，「我甚至不在乎这些人的信仰是否真实。我只想活得像他们一样。」尽管声称不在乎基督教是否真实，她却很快决心寻找能让自己信服的真理。

几年后，露丝写给她的朋友说：

当我重新确信天主存在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唯一理性的选择是深入认识祂及其旨意——毕竟按定义而言，天主远比世上任何事物更值得追求且更为重要。如今我难以理解或想象，为何有人既信奉天主却不认为必须竭力将祂置于生命核心。此举听来或许令你倍感疲惫，但请思索这点——教会始终教导：上帝造人时赋予其追求幸福的天性，而唯有与祂合而为一，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非短暂的欢愉或分心）。因此，将注意力持续转向天主，实为人类最自然的本性。

在露丝教授的「空间、时间与运动」课程班级里，有位名叫麦可·帕卡卢克的学生。这位曾是天主教徒的他，以宗教怀疑论者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期间，他险些溺水身亡，此后便踏上探索基督教真实性的旅程。麦可与露丝开始交往，很快便陷入热恋。麦可形容他们的「相恋过程与忠于共同渴望密不可分——那份渴望正是探究基督教是否可能为真的信念」。两人身边既无基督徒同学也无基督徒教授，这份厘清信仰真伪的决心，瞬间成为维系彼此的羁绊。

露丝和麦可都深信关键在于如何生活。大二结束时，他们认定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须归属于一个基督教团体，于是开始参加位于剑桥公园的联合教会公理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教会过度聚焦社会政治议题、却对神学与灵性漠不关心的现象日益感到沮丧。尽管仍持续参与该教会礼拜，他们同时加入了哈佛大学的福音

派校园团契 (IVCF)。原以为能在此频繁参与哲学与神学议题的智性辩论，却发现这里充斥着情感激昂的氛围，更强调维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1978年秋天，露丝与麦可于她父母的长老会教堂完婚。当时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中仅有寥寥数人已婚。帕卡卢克夫妇租了一间小公寓，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他们每周仅拨出二十美元购买食物——即便在当时也是微不足道的金额。之所以能如此节省，源于他们对全球饥饿问题的深刻关注，进而成为素食主义者。透过大量采购与拒绝加工食品，他们每日饮食支出压低至75美分以下。他们奉献十分之一收入——包含税后所得与助学金——给教会、校园团契，以及两家他们心仪的慈善机构：乐施会与世界之粮组织。起初露丝与麦可都坚决排斥天主教——露丝源于成长环境中改革宗教会的反天主教立场，麦可则认为童年名义上的天主教信仰是阻碍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的虚假宗教。当麦可带领

的校园团契小组成员柯特宣布要接受天主教教理课程时，两人皆深感震惊。这对夫妇与柯特长谈，却发现自己无法反驳他皈依天主教的理由。

他们接触天主教会的重要契机，是马尔科姆·马格瑞奇所着的德蕾莎修女传记。正如麦可回忆：

德蕾莎修女显然是位虔诚祈祷的女性，一位真正的基督追随者，更是一位圣洁之人。这对我们构成了难题：为何在虚假背道的基督教形式中，唯独能找到我们眼中对苦难、虔诚与圣洁的真实诠释？早期教会曾针对基督展开辩论：祂要么是恶人，要么是神，中间没有灰色地带。祂不可能仅仅是个道德导师。我们隐约感到此刻正面临类似的困境。天主教会要么极其邪恶，要么极其崇高。然而德蕾莎修女却让前者选项显得难以成立。

他们阅读了大量关于天主教会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书籍，尤其专注于耶稣会士约翰·哈登神父的著作。渐渐

地，他们开始认同教会在堕胎与避孕议题上的立场，并钦佩教会捍卫这些立场的勇气。1978年圣诞节前后，他们决定停止使用避孕措施。麦可如此解释他们的决定：

避孕所衍生的态度（即「避孕」心态）与基督徒应有的态度背道而驰。数世纪以来，基督徒始终拒绝避孕。人们很容易相信，多数基督宗派在这个议题上的教导之所以改变，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世俗化——也就是随波逐流——就如同许多教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一样；而堕胎无疑是错误且不合基督信仰精神的。同时我们认为，若拒绝避孕成为现代世界中对基督真正忠诚的某种「试炼」，也毫不令人意外。依我们所见，每个世代都有其试炼——对每代基督徒而言，总存在某种世俗推崇而基督徒必须拒绝，或世俗排斥而基督徒必须拥抱的实践；这实践需要牺牲，对世俗而言毫无意义，但对基督徒而言却是追随基督真门徒的明证。既然此类试炼必

然存在，避孕手段似乎正是合适的选项。因此我们决定，身为基督的追随者，应停止使用避孕措施。然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否该尝试生育——我们并未深入探讨。身为学生，我们仅凭直觉认定不该生孩子。

至1980年春天，露丝与麦可皆倾向加入天主教会。然而由于麦可获得马歇尔奖学金赴爱丁堡深造，两人将于秋季移居苏格兰两年，故不愿仓促决断。待抵达苏格兰时，露丝已下定决心，麦可却仍存疑虑。在爱丁堡，两人开始于大学天主教校牧室接受要理课程。露丝写信给公婆：「我们的生活如此顺遂——我常惊叹于蒙受的恩宠之多且深。艰难时刻或许会来临——这始终掌握在天主全能之手——但我并不忧虑。这一生能拥有我两年内经历的喜乐的人何其稀少！」平安夜当晚，麦可办了总告解并领受圣体，露丝则正式加入教会并领受坚振圣事。

不久，他们开始参加每日弥撒。麦可解释了他们的决定：

我们坚持，皈依天主教并未改变我们身为福音派基督徒的事实。如今我们是信奉天主教的福音派信徒，深信我们所珍爱并在福音派基督教中寻求的信仰精髓，在天主教会的圣徒身上得到了最纯粹的守护与彰显。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坚信每日应有「静默时刻」，藉此与基督对话，建立个性化的灵性关系。我们渴望尽可能亲近基督——正因如此，我们竭力效法初代基督徒的样式。我们逐渐领悟到：弥撒是超越时空的主的晚餐。参与弥撒即是在主的晚餐桌前，与使徒们并肩而坐，在亲近基督的层面上与他们完全平等。早期基督徒所享有的优先权，凡参与弥撒者皆能享有。既然如此，我们推论：还有什么比参与弥撒并在其中祈祷更美好的祷告方式？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深化我们所追求的与基督的个人关系？因此，我们每日「静默时刻」的实践自然延伸为每日

参与弥撒。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追求在其他时段静默祈祷、在隐密处祷告；但我们认为，每日最初可供祈祷的时光——如同时间的「初熟果实」——理当献给弥撒。

露丝和麦可发现很难坚持每天参加弥撒的决心。他们能成功维持几天或一周，随后又会松懈一两周。两人皆认为这种状况不可接受。他们意识到需要帮助，却不知该寻求何种协助，或该采取何种形式。多年后，当他们初次接触主业团时，立刻明白这正是他们长年寻觅的答案。

他们的长子麦可于1981年11月27日出生。据她丈夫所述，孩子的出生让露丝变得更加无私。他回忆道：

夜里有两次，[麦可]发出些微的躁动声响，露丝便立刻在黑暗中起身抱起他哺乳。这份奉献令我惊叹不已。当然，这很合理：当婴儿夜里啼哭时，你必须喂养他。

但我在露丝身上看过那种前所未见的直率、自然且不做作的无私。她从不抱怨，更不会在床上磨蹭片刻。婴儿一发出声响，她便立刻跳下床去照料他。

麦可的诞生也改变了露丝对堕胎的态度。在过去一年间，她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从理性层面确信堕胎等同于夺取无辜生命。这种信念因她接受教会对此议题的教导而更加坚定。她虽深信不疑，却未曾真正投入反堕胎运动。丈夫注意到，随着麦可的诞生，她开始以崭新且更迫切的视角审视堕胎争议。她自身也察觉到这份转变，当时在谈及友人流产经历时写道：自己再也无法「对他人孩子的死亡抱持哲学式的态度」，「过往看似悲剧的事件，如今细想竟是纯粹的恐怖」。此刻她反对堕胎的立场，已深深植根于自身为人母的体验，不再仅是哲学论证中冷静理性的结论。

1982年夏天，在苏格兰度过两年时光后，帕卡卢克一家重返哈佛大学，麦可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他们于哈佛度过的六年时光里，又迎来了两个儿子——麦可斯（1983年6月出生）与约翰·亨利（1986年3月出生），以及女儿玛丽亚（1987年10月出生）。他们曾短暂考虑送小孩去托儿所，但露丝最终决定不愿让孩子由他人抚养——尽管这些人或许称职甚至友善，却无法给予真挚的爱。

为补贴麦可微薄的津贴，露丝在房东那里找了份兼职，负责簿记和一般办公室事务。这份工作对她这般聪慧学识的人而言，本该极其枯燥乏味，但她专注于其优点，写信给朋友说：

「这份工作很有趣，非常方便，收入也相当可观。」

成为主业团成员

在苏格兰时，一位朋友曾赠予帕卡卢克夫妇一本圣施礼华的著作《道路》，但他们与主业团的初次接触，

源于一位哈佛研究生在每日弥撒中看见麦可，并邀请他参加在哈佛附近主业团中心举办的夜间退省——该活动由萨尔·费里格勒神父主讲。麦可深受所闻内容震撼。他回忆道：「这正是我皈依的天主教信仰，也是我在圣人著作与早期教会文献中读到的真谛。」他当即安排接受萨尔神父的灵修指导，并开始参加其开设的天主教教义课程。

当麦可向露丝解释他对主业团的了解时，她表示认同，认为这似乎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

自从我们皈依天主教以来，便意识到在实践内在生活时需要某种帮助，某种外部结构（我们如此向自己解释）。首先，我们明白自己需要一位灵修指导者……主业团的神父们显然是圣洁且学识渊博的教会人士，能够提供这类指引。其次，我们意识到自己未能持续参与弥撒与诵念祷文。这方面的表现时好时坏，取决于环境艰

困程度或主观感受；然而显然有许多主业团成员，多年来始终在生活种种困难中，持守着严谨的奉献生活。

露丝随即开始参与主业团的培育活动，并接受萨尔神父的个人灵修指导。她称萨尔神父为「我所认识最圣洁的神父」。萨尔神父对露丝亦深感钦佩，尤其欣赏她那股传教热忱。

大约一年后，在1984年夏天，露丝成为主业团的已婚会员。麦可则在数月前已加入该组织。他们开始实践成员的生活计划，参与学习圈及其他灵修培育活动，并以友谊为基础，默默开展使徒工作。

他们也开始与其他与主业团相关的人士建立友谊，特别是珍与汤姆·哈迪夫妇。当时哈迪家有六个孩子，这个数字让麦可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怎么能应付得来？」他和露丝不禁自问。

「怎么可能同时照顾这么多孩子，还能负担所有开销？」然而当他们见识到哈迪夫妇兼具基督教理想主义、务

实智慧与勤奋精神——更惊讶于他们对「支持堕胎权」的犀利批判时，当即深受感动，渴望尽可能多与他们相处。

反堕胎的倡议者

露丝投身反堕胎运动的契机，源于她在哈佛大学参与的一场辩论。反堕胎发言人的有力论证令她深受震撼，而最令她震惊的，是支持堕胎发言人不愿正视堕胎等同杀害无辜生命这项论点。她与哈佛教育学院研究生保罗·斯沃普共同创立了哈佛-拉德克利夫人类生命倡导者组织。

不久之后，许多与大学无关的剑桥居民也参与其中，露丝于是决定成立第二个团体，名为剑桥未出生者权利倡导者（CURA）。短短一年内，CURA便拥有超过三百名活跃成员，并在剑桥市发起多项活动，包括为全州性生命权组织「麻州生命公民联盟」（MCFL）募款；举办年度晚宴并邀请专题演讲者；举办教育讲座；派遣

巴士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年度为生命游行活动；挨家挨户分发宣传册；以及为孕妇募集食物、衣物和婴儿用品。CURA将自身使命定位为教育倡导，但许多成员同时投身危机怀孕中心志愿者服务，并协助支持生命权的政治人物竞选活动。

麻州生命权公民组织董事会成员

麻州生命权公民组织董事会成员透露，初次见到露丝时，「我的第一印象是她容貌出众——外表极其美丽——口才惊人且极具智慧。我当时心想：'这正是我们需要培养的人才。'我们当即明白，露丝注定会成为璀璨之星。」

1984年，在深受CURA活力所感动的MCFL干部敦促下，露丝参选并成功当选该全州性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她旋即领导推动一项州宪法修正案，旨在将堕胎权限缩至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认可的范围。该修正案虽以微弱差距

未获通过，但公众对此议题的辩论为传播反堕胎观点提供了诸多契机。

政治与社会活动

在1984年总统大选前，露丝写信给一位朋友：

我即将成为一名注册共和党员。民主党对堕胎的全力支持促使我转变立场，但当我深入思考其他议题时，发现自己逐渐接近现任政府推崇的自由企业与最小政府理念。尽管我对其在污染等领域的政策上存在许多保留。我对军备扩张也持强烈保留态度，但我深知堕胎等同于剥夺人类生命。这与宗教信仰无关，而是纯粹的生物学事实。

选举后的几个月，她告诉同一个朋友：

我确实投票给了里根。我甚至敦促他人效法，并协调分发约三千份传单，目的在说服人们跟随我的脚步。我这

么做的唯一理由（或者说，我这么做的首要理由）是堕胎议题。对我而言，堕胎杀害人类的事实显而易见。我常自问：若生于希特勒统治时期，我是否会为屠杀无辜者辩护？即便明知发声可能招致死亡，我仍无法想象自己能坐视社会纵容杀害无辜婴孩。我不喜欢发传单。我不喜欢示威游行，不喜欢政治行动主义；但我没有选择沉默的自由。

尽管主要关注堕胎议题，露丝同样忧心全球贫困与饥饿问题。尽管家庭预算极为拮据，帕卡卢克一家仍持续慷慨捐助「世界之粮组织」、「天主教救济服务会」及「乐施会」等机构。露丝更拨冗撰写信函，敦促美国对待贫穷国家时秉持更公平的态度。

麻州生命权公民组织主席

1987年，露丝当选为MCFL主席。她与保罗·斯沃普携手推动各个办公室的现代化，提升募款能力，并建立组织快速发布新闻稿的机制以应对突发事

件。在露丝领导下，MCFL实现了显著成长。该组织的游说能力持续扩张，成功在委员会层级阻挡数项支持堕胎权的州立法提案。

在他当选后的几个月，她写信给一位朋友：

我现任本州反堕胎组织主席，这份工作颇令人振奋。我需要招聘员工、频繁应对媒体、做与电脑系统相关的决定、进行市场调查等。谢天谢地我不用朝九晚五上班——前任主席们大多如此。带着三个男孩四处奔波已够辛苦，但比起老板，他们可灵活多了。

露丝在堕胎及其他「生命议题」上的演说天赋，早在担任MCFL主席时便已显露——当时她常受邀参与新闻节目或校园演讲。她偏好辩论而非演说，即便主办方未规划辩论环节，她仍会设法说服对方邀请支持堕胎权的讲者。「若举办演讲，到场的不过数十名早已立场坚定者；但若举办辩

论，数百人会前来参与，其中许多人真正渴望了解真相。」

麻萨诸塞州伍斯特市

1987年，帕卡卢克一家迁居至麻州伍斯特市——这座距波士顿西行四十英里、拥有约十五万居民的城市。麦可在此获得了克拉克大学的教职，该校是所声誉卓著的文理学院。从学术角度看，这份聘任颇具吸引力，但薪酬微薄。他们寻觅居所的过程，用麦可的话说，揭示了美国经济体系已不再为单薪家庭设计的现实。现实是，即便在相对廉价的都市里，最不起眼的社区里最便宜的入门级住宅，我们也负担不起——因为如今双薪家庭的收入，往往都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们最终只能蜗居于一栋破旧不堪的小屋，所在社区多为非法移民居住。搬入时，屋内没有热水供应，地毯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炉灶和冰箱都亟待更换，而他们的汽车也已使用了十五年。

他们努力将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有一次拜访一对夫妇时，这对夫妇都是成功的营销专业人士。他们询问露丝为何选择购买某种产品而非其他产品。

「很简单，」她说：「我计算每单位的成本，然后购买最便宜的品牌。」

「你对品牌没有偏好吗？比如说，你不喜欢佳洁士牙膏胜过高露洁吗？」

「佳洁士或高露洁！」露丝回答道：「你开玩笑吧。那些牙膏实在太贵了，就算打折也一样。」

尽管收入微薄，帕卡卢克一家始终量入为出，从不觉得需要更多钱。他们持续奉献什一奉献。某年发现将获得意外可观的退税款时，他们认为这笔钱不该用在自己身上，便捐给天主教救济服务会，认为穷人比他们更需要这笔钱。

麦可回忆道，尽管经济拮据，我们的家充满欢乐，以独特的方式蒙受丰盛的祝福。例如，每当放学时分，露丝总会为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准备好现烤的点心；又或者在炎热的夏日，她会所有人——包括朋友们——都塞进车里，载着他们去贝尔池塘或拉特兰州立公园游泳。

搬到伍斯特约一年后，露丝获邀加入主教座堂的专业合唱团。她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朋友：

我又加入合唱团了。不是随便哪个合唱团，而是主教座堂的专业合唱团。听好了——我能领着薪水，不用带孩子出门，还能唱美妙的音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歌喉并非顶尖，但正努力精进。距上次专注于音准与和声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幸好我视唱能力尚可，数拍子也比多数团员强（为何歌手普遍如此不擅数拍？）。

一个小孩的逝去

帕卡卢克家的第五个孩子托马斯于1989年9月出生。出生七周后，他因婴儿猝死症离世。全家陷入崩溃，但露丝与麦可拥抱这份苦难，并从中看见——用麦可的话说——「一种『严厉的慈悲』，是与基督十字架的共融，将带来诸多祝福与恩宠」。托马斯的葬礼结束后，麦可只想回家与家人独处，或许睡一觉。露丝却渴望庆祝。当殡葬弥撒结束离开教堂时，她双手合十，绽开灿烂笑容说道：

「好，我们来办场派对吧！」她要庆祝托马斯已获得天国的喜乐。

她渴望庆祝托马斯在天堂的喜悦，并不意味着她感受不到失去幼子的痛楚，或未能为此哀悼。当有人评论说托马斯既然在天堂，其实并未真正失去什么时，露丝回应道：托马斯失去的是作为男孩成长的机会，以及享受天主所创造的世界中所有美好与欢愉的权利。

数年后，一位刚痛失幼子的友人问露丝：失去孩子的伤痛是否永不痊愈？露丝如此回应：

心灵或情感的创伤，那份悲痛，与身体的伤口极为相似。它会悄然愈合。当心血淌满地板时，你无法正常生活。你的儿子明白这点。然而，我每天仍会向托马斯寻求慰藉。请为儿子虔诚祈祷，将这份心意融入日常祷告中。如此一来，你既不必担心撕裂伤口，也不必害怕遗忘。

露丝本人养成每日沐浴后重新佩戴棕色圣衣时亲吻的习惯，并如此祈祷：

愿此吻成为对天上的母亲玛利亚的爱意——恳请她将这份爱意转达给我的儿子托马斯——请他为母亲祈祷，为父亲祈祷，为手足、祖父母与堂

（表）兄弟姊妹祈祷，为父亲（即主业团监督）的意向祈祷，并为反堕胎运动祈祷。

她感受到托马斯正从天国注视着她，这份感知促使露丝在灵性生活中更加慷慨。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托马斯已很好地引导我走在狭窄的正道上。促使我履行规范（即构成主业团成员生活计划的信仰实践）的，并非默观主耶稣的圣伤或十字架下的圣母。而是当我的婴孩凝视着我时，那份羞愧感——他正疑惑着为何母亲如此愚昧，竟认为打字编印通讯或折叠衣物比祈祷更重要。

麦可回忆道：「露丝曾祈祷，盼望另一个孩子能抚平她的悲伤。当莎拉·艾丝特在托玛斯离世不到一个月时受孕，并在他逝世不到一年后诞生时，她便如同圣经中许多妇女那般，将这份恩宠视为对她祷告的具体回应。」正如露丝后来向莎拉倾诉：「在失去小托玛斯的悲伤与空虚之后，你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欢欣与心灵疗愈。你是天主赐予母亲的珍贵礼物与祝福。」

33岁时罹患癌症

1990年7月，露丝怀着莎拉时，发现乳房有肿块，但医生向她保证无需担心。到了1991年秋季，肿块已清晰可见，她再次向医生反映。尽管医生再度淡化她的担忧，露丝坚持要求进行乳房X光摄影检查，结果显示出四公分大的癌性肿瘤。同年十月，她因二期B癌症接受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并展开为期五个月的化疗疗程。

露丝从手术中迅速而轻松地恢复，但她写信给朋友说：「化疗实在令人不适。虽然真正让我完全虚弱的只有两三天，但之后还得轻松一周左右。」圣诞节时，她向另一位朋友倾诉：「我完全确信，无论结果如何，天主必会使这经历结出善果。不过，若能多为我祷告，我仍会感激不尽。」

她在致一位癌症病友的信中写道：

化疗期间，我的生活并不完全正常。我花费大量时间沉思、祈祷与阅读。尽管身心俱疲，我仍努力维持某些日常惯例——例如持续在高中进行反堕

胎演讲。过程艰辛，但每次结束后总感到欣慰。前一晚还觉得不可能办到的事——当天清晨将婴儿托付保母、精心打扮出门——我却总能咬牙坚持，最终发现自己确实办到了。天主教灵修精神强调将苦难奉献。这听来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我发现它极具助益。耶稣从天而降，正是为了与我们共度人生。祂甚至愿与我们同尝痛苦、恐惧、孤独与煎熬。当遭遇这些苦楚时，默想独自承受十字架之痛的耶稣，便能带来力量。我们渴望效法祂，愿与祂分担苦难、与祂相伴，而非像伯多禄、雅各和若望那样沉沉睡去。祂必接纳我们在试炼中的坚忍，如同祂的复活，将苦难化为荣耀。

她告诉另一位癌症患者，化疗期间自己总感到隐隐作呕。

但对我而言更难熬的是心理层面的煎熬。我向来不是个爱心的人，鲜少受焦虑或抑郁困扰。然而化疗期间，我却会经历剧烈的恐慌发作。明明正舒

适地坐在沙发上，心脏却会突然狂跳，肾上腺素涌现，全身出现彻底恐惧的所有症状。我试图告诉自己无需害怕，来驱散这些症状，但却毫无作用。我确信这并非对死亡的压抑恐惧，纯粹是化疗的副作用，在治疗结束数周后便消失无踪。这正是我想向各位传达的体验：化疗后的生命依然美好。无论疗程中你感到多么病弱、疲惫与沮丧，当一切结束时，你终将恢复原本的状态。有些人开始认为化疗期间的感受源于癌症本身，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纯粹是化疗药物带来的影响。

化疗结束几周后，露丝告诉朋友：

「我终于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了。身体好起来的感觉真棒——当你长期处于隐隐作痛的状态，会忘记正常感觉有多美好。最近光是能正常品尝味道、嗅闻气味，就让我整天雀跃不已。真希望永远保持这种状态，不再

视之为理所当然，但这就是人性吧。」

露丝的主治医师建议至少等待三年再尝试怀孕，届时癌症复发风险会降低。

若过早怀孕，癌症可能随时复发，而怀孕将限制多种治疗方式，甚至可能加速癌细胞生长。露丝与麦可仔细斟酌医生的建议，并向天主寻求光照。然而最终，正如露丝所言，他们认为「与其畏缩于恐惧中，不如怀抱癌症不再复发的希望活着。即使生命可能因癌症复发而缩短，我们仍认为生育更多孩子是件美好的事。」不久后她怀上安娜·索菲亚，孩子于1993年4月诞生。

医疗疏失的诉讼

麦可回忆道，当露丝得知自己罹癌时，最初的反应是感到羞辱，仿佛被耍得团团转，因为她深信医生「不是癌症」的诊断，竟让易于检测的恶性

肿瘤，在她乳房内肆意生长整整一年。她经历了一段极短暂的情绪动荡期——仅仅一两天——先是对医生充满愤怒，随后转为怜悯与宽恕。

她迅速化解了所有情绪纠葛——这令我深感惊叹。她亲自原谅了医生，从她的言行举止来看，从未对医生怀恨在心或持续怨怼。

然而这并未阻止她提起诉讼。和解金让全家得以购置更好的住宅，支付天主教学校学费，后来更供孩子们进入私立大学就读。

进一步的反堕胎活动

初次化疗结束后，露丝迅速恢复体力，再度投入旋风般的活动。约莫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享受着看似健康的状态。除了打理家务与持续参与主业团活动——例如每周为协助人授课——她还满档地奔波于哈佛神学院、霍利奥克山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福坦莫大学、布兰迪斯

大学、布朗大学及阿默斯特学院，进行反堕胎演讲。

1992年最高法院作出凯西案判决后，露丝认为继续致力推翻罗伊案已无意义。正如她在访谈中所言，其反堕胎活动（包括多次面向高中生的演讲）旨在说服听众：

他们自己不愿堕胎，或若知晓有人正考虑堕胎，或许能真正劝阻对方。或许我能说服某些人像我一样积极行动。因此我努力做的事，就是说服人们这并非好事，世上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

根据麦可的说法，露丝看待堕胎争议，并非某种哲学命题的意见分歧——「胎儿是否为人？」——而是两种文化的分歧：既然（众所周知）女性子宫内的生命是活生生的人类，我们该遵循「所有人类在本质上平等」的原则行事，抑或采取「为解决问题而杀害某些人类是可被容许」的态度？前者是生命文化，后者则是死亡

文化。她认为这两种文化正在争夺她所面对年轻人的效忠，而她的关切在于教导他们应知之事，使他们得以选择生命。

露丝不认同所谓的文化战争及其伴随的修辞。她不断寻求搭建桥梁、寻找共同点的方法，对象不仅是立场未定者，甚至包括堕胎倡导者。在堕胎争议中与她对立的前大众选择组织主席，得知露丝的癌症已转移至肝脏时，竟致函表达同情。露丝回信时字里行间流露的亲切与意外亲密，令人动容：

我对现状最常感到遗憾的一点，是没有再添一个孩子。……对天主教徒而言，能几乎确知死亡迫近，实为莫大恩宠。这些年来，我享受——不，是细细品味——的时光，远胜过人生其他任何阶段。我几乎从日程中剔除了委员会会议，仅让演讲邀约带我离开家人。我竭力营造家庭生活的宁静、欢愉、趣味与温情，自认已取得些许

(微薄的)成就。我既不畏惧死亡，亦不惧怕死后之境。必须坦承，偶尔我甚至渴望脱离这尘世纷扰。若你具备同理心，便能体会我们这些反堕胎人士在此国度生存何等煎熬。试想我们目睹女性将亲生骨肉视为待灭敌人，抛弃天主赐予她们去爱与被爱的无价礼物时，内心该有多么沮丧。正如德蕾莎修女所言：堕胎最深的罪恶，在于参与者心中爱的逝去。

涉入政治

露丝逐渐深入参与地方政治，成为地方有线新闻节目固定的政治评论员。她写信给朋友：

又有一则趣闻。我受邀参加地方有线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主持人想打造本地版的《麦克劳林小组》。他说我可以担任他们的伊丽诺·克利夫特（那位进步派评论员）。我真想说「除非我死」——这更像是帕特·布坎南（右翼评论员）男扮女装的样子。。我觉得这会很有趣。你知道我向来热爱辩

论。但谁能想到，当年在北谷中学的日子里，我竟会成为正统天主教右翼共和党人？

她还开始主持自己的每月电视节目，每次邀请反堕胎、基督教或维护家庭圈子里的知名人士或领袖进行访谈。

即使在化疗期间，露丝仍与友人玛丽·穆拉尼携手，成功阻止了计划生育协会设计的性教育课程在伍斯特市实施。该课程强调「安全性行为」，并将婚前性行为视为完全合理的个人选择。她们成立了「负责任性教育委员会」。短短数周内，该组织便动员数百名伍斯特市民，向校务委员会表达反对意见。她们不仅抵制原提案，更拟定替代课程的指导方针。露丝每次开会后都精疲力竭，却仍坚持不懈，最终促使计划生育协会的方案被撤回，转而采用更为可接受（尽管仍不完美）的替代方案。

或许是受到这次行动成功的鼓舞，玛丽决定参选校董会。当时已从化疗中

康复的露丝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她统筹了向全市每户家庭派发传单的行动，并组织妇女们手持标语站在街角。尽管胜算渺茫，这些努力终究有了回报。露丝曾向友人坦言：「我热爱政治。这是一场关乎实质利益的激烈竞赛，但即使落败，总有下一场选举让你重整旗鼓。」

露丝参与玛丽的竞选活动、反堕胎运动以及其他诸多事务，有时会引发家庭紧张。麦可回忆道，露丝从未在未征询他意见的情况下投入玛丽的竞选活动，而他总是热情支持。但当真正需要付出牺牲时，他有时会抱怨不满。他回忆起某次经历。

某晚玛丽竞选活动期间，我们与五个孩子围坐餐桌共进晚餐，正规划着下周的行程。当时有几场活动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共同出席——如今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但当我逐一提及时，露丝却反复表示无法抽身：「我没空，因为要协助玛丽的竞选活动。」此前

数周，露丝早已被照顾小孩的工作、传单派发、策略会议等事务缠身。我忍无可忍，怒火中烧地站起身吼道：

「去他妈的玛丽竞选活动！」随即冲出餐厅。当我踏进厨房时转头望向露丝，她竟露出笑容，朝我比出中指，冷冷道：「那你也去他妈的！」

目睹全程的孩子们吓坏了——因为我们几乎从不在他们面前争吵，更绝不使用粗俗言语。但争执仅持续数分钟，我自然当着孩子们的面向露丝道歉。

露丝同时也参与州议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她协助修饰候选人的诉求，同时也负责装信封、挨家挨户拜访，并在繁忙路口举着竞选标语站岗。

妻子、母亲和朋友

露丝使徒工作的最显著部分，在于领导反堕胎组织、参与辩论及参加电视节目。但其使徒工作的核心，实则奠基于祈祷、牺牲、对家庭的奉献、以

友谊为基础的深度对话，以及她以身作则的力量。她生命的本质，根植于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一位友人如此写道：

我常沉思露丝如何选择成为妻子与母亲，并在其中圣德日增。她确实展现了在日常琐事中——无论是洗衣、开车往返两地——于当下环境中逐渐成圣的典范……我认为她正是透过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并将这些付出奉献给天主而圣德日增。我认为她正是借着这些时刻——当她祈祷并将工作奉献给天主时——在圣德中成长。而这份恩宠赋予她力量，得以运用才干完成其他事务。那些事务不过是额外之事。在她生命的中心，我认为始终是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露丝本人曾写道：

家庭主妇不仅要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还要承受聆听孩子打架、哭闹和抱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但我们却拥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空闲时间去思考

自己的事情，以及与朋友聊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吸引我了

露丝极为珍视友谊，并刻意深入认识每一位相遇之人。她的友人回忆道：「她总会迅速抓住任何出现的人。若不让对方彻底自我介绍并交谈一番，她绝不会放人离开。」例如玛丽·穆拉尼——这位毕业于圣母大学的律师，在读书会月会上结识露丝，她如此回忆：

我们两个都不擅长闲聊，于是聊到了教会关于节育的教义是否绝对正确。露丝说教会的教导绝对正确，但我对此并不确定。第二天，露丝来到我家——我记得她步履蹒跚地走上阶梯——怀里抱着四本厚厚的书。她坐在沙发上，给我看了所有支持她观点的引言。我当时震惊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次普通的咖啡闲聊，竟然会促使一个刚认识的人回家收集资料、整理论证，然后再次横跨整个城

市，只为说服我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的。

从那一刻起，玛莉就知道露丝是她想要结交的好朋友。回想起露丝对她生命的影响，她意识到：

真正触动我的，并非是读书会上的任何争论或任何人的发言，而是只是看着露丝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无法体会到为人母的喜悦。所以，露丝就是我的榜样。关键在于：看看眼前的快乐，然后乖乖排队。

露丝去世后，一位朋友与麦可交谈，回忆道：

「我亲眼目睹了露丝一天能做多少事。而且，你在谢尔比街的房子并不大，但露丝却在那里招待客人，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看到这一点，我也更加敞开家门，邀请了更多的人来家里做客。看到露丝一天做那么多事，我也更愿意去做很多事情了。」

另一位女士格蕾丝·查弗斯回忆说，她第一次认识露丝时，就被露丝的「快乐和宁静」所打动。「她身上有一种平和的气质，而我没有这种气质，我渴望拥有。」这最终促使格蕾丝重新思考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她不再生育的决定。她解释说：

在认识露丝之前，我只是随口否定了教会关于避孕的教导。从来没有人挑战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但露丝并没有透过任何谈话或教导来挑战我，而是仅仅因为她是那么多孩子的母亲。我像现在经常听到的那样问她：「你有几个孩子？」（人们会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她只是非常愉快地解释说，这是她信仰的一部分。她毫不怀疑，也毫不动摇。她只是欣然地这么做。

格蕾丝发现自己对主业团的圣召后，感谢露丝为她祈祷。露丝家里没有洗碗机，她笑着低头看着地板说：

「嗯，过去一年你一直在帮我洗早餐

碗碟。」格蕾丝没有多说什么，但她心里想：「哇，这就是主业团。」

癌症扩散至骨骼

1993年圣诞节前夕，露丝发现癌症扩散到骨骼。在圣诞信的结尾，她先是谈到了孩子们，然后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

1993年以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告终。我的癌症复发了，转移到了右髋关节和脊椎。传统医学无法治愈转移性乳腺癌，所以我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几年时间）。到目前为止，我和麦可（毫无疑问是超性地）接受了天主的安排。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祂的旨意与我们不同。

露丝组织了一个玫瑰经小组，成员们每周聚会一次，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念玫瑰经，然后喝咖啡聊天。在一月份的聚会上，露丝告诉朋友们她的癌症已经转移。「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病情和治疗的一切告诉

你们，但之后，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她解释说，骨癌可以控制两到三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更久。只要癌细胞还留在骨头里，她就可以接受荷尔蒙治疗，这种治疗的副作用不会像她之前的化疗那么严重。然后她拍手喊道：「好！——现在让我们一起诵念玫瑰经，祈求麦可能找到一位年轻的妻子！」

为了孩子们，麦可需要再婚的想法并非一时兴起。她曾对朋友们说：「最痛苦的是，害怕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死去。我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再娶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痛恨孩子们在没有母亲的陪伴下长大。」在去世前不到三个月，在一次特别亲密的时刻，再娶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痛恨孩子们在没有母亲的陪伴下长大。」在去世前不到三个月，在一次特别亲密的时刻，再娶的可能性向麦可吐露心声，她认为他应该娶他们朋友汤姆和珍·哈迪的长女凯瑟琳·哈迪。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相信

天主会安排一切，即使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完全相信，无论结果如何，天主都会从这段经历中带来益处。」她也写信给另一位朋友说：

「奇怪的是，死亡的前景并没有让我感到那么困扰。我真的相信，无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最终都会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他想让我在三十岁之前死去，我相信这其中必有益处。」我祈祷我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坚定的信仰，我的妹妹能与家人和好，我的孩子们能在信仰中成长——诸如此类。我再次恳请你念诵这张祈祷卡（向主业团创办人祈祷）。他理应保佑我。他也以祝福那些虔诚念诵这张祈祷卡的人而闻名。我真心希望这也能对你有帮助。

得知癌细胞已扩散至露丝的骨骼，结束了她过去一年来对是否战胜癌症的忐忑不安。露丝写信给一位同样被诊断出乳癌的女士，倾诉了这段经历：

「当我被诊断为转移性疾病时，我的疑虑就消除了。但那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也并非全然没有意义——它让我更加顺服天主的旨意。现在，说来也怪，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我相信你也会发现，这段经历让你更加亲近天主，相信祂有时难以理解的智慧，能够从苦难中带来祝福”。

露丝的医生建议她接受一种常见的荷尔蒙治疗，虽然有一些益处，但并不能治愈癌症。露丝担心自己或许该坚持接受骨髓移植（BMT）疗法。这种痛苦且令人虚弱的治疗风险极高，因为免疫系统会被暂时摧毁，而且如果骨髓移植失败，患者很快就会死亡。治疗期间需住院数周，身体虚弱数月。但这或许能带来长期生存的希望。露丝觉得，如果治疗失败，让她所剩不多的时间被这种痛苦的治疗毁掉，实在可惜。但她也担心，或许正是因为她对天主的信德以及对升入天堂日益增长的渴望，她低估了治疗的

潜在益处。她花了数周时间阅读医学文献，并咨询专家。她最终决定不做骨髓移植，但如果新的信息指向骨髓移植，她仍然会考虑这种可能性。

与骨癌抗争的五年

五年来，露丝的癌症一直局限于骨骼，这使她能够过着非常积极的生活。她继续着之前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甚至尝试了一些新的事物。确诊后不久，她的朋友斯沃普夫妇提议她生平第一次去滑雪。露丝欣然接受了邀请，和斯沃普夫妇以及她几个较大的儿子们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度过了一周的滑雪时光。到周末时，她已经能够顺利地滑下山坡而不会摔倒了。

露丝一直是个「社交达人」，但现在她更重视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时光。正如她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让我更愿意放下洗衣和家务，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去听好友的音乐

会。这又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像'家族传承'中应该留给孩子们的是什么样有趣）。当你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你应该如何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幸运现在没有强烈的欲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真的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我确实觉得，多花时间陪伴自己喜欢的人非常重要。

1998年1月，露丝得知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生命只剩不到一年。当晚，她便前往当地一所学校，为孩子们演讲。第二天，她参加了基督教教义兄弟会教师晚宴。再过一天，她又在一所高中发表了演说。两天后，她开始接受肝癌化疗，几天后，她又为一百多名高中生做了演讲。直到生命垂危，她依然坚持担任堂区宗教教育主任，负责高中青年小组的工作，在主教座堂唱诗班献唱，主持每月一次的读书会，并为主业团协助人授课。所有这些，她都同时兼顾照顾家庭。

六月底，露丝与拉尔夫·麦金纳尼教授在圣母大学共同教授了一门为期四天的天主教基础课程。八月份，在新罕布夏州与家人度假期间，尽管她的腿里有一根钢钉来加固被癌症侵蚀的骨头，但她还是开车登上了新英格兰最高的山峰——华盛顿山，然后徒步下山。

肝癌化疗导致露丝提早停经，并深深影响了她的情绪。三月底，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我的情绪在深深的、痛苦的悲伤和一种宁静的喜悦之间交替。我努力提醒自己，我应该为有机会将我的苦难与基督结合而感到高兴。然而，当我真的感到痛苦时，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这真令人厌烦。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多年来，我感觉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情绪，而且所有情绪的强度都相当合理。孩子们带来的快乐，麦可难搞时我的恼怒，以及和他相处融洽时我的满足，大概就是这些。现在，我的情

绪似乎完全主导了我对现实的感知。这一定是更年期。这感觉很奇妙，偶尔令人愉悦，但更多时候令人痛苦。

大约在同一时间，她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不信教的高中朋友：

我的癌症无情地侵蚀我。它已经扩散到我的肺部和肝脏。我余生都会接受某种形式的化疗，而我的余生很可能不会太长。但我并不抱怨。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我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我拥有许多天赋和才能，让生活充满乐趣（唱歌、表演、演讲等等）。我的丈夫很棒。我的孩子们也很棒。而我真心信仰天主教。人生短暂，它只不过是通往真正人生的一次资格考试。我很遗憾没有经常写信给你。你的友谊一直是我快乐的泉源。

1998年4月底，露丝再次写信给这位朋友：

我并不害怕死亡——一点也不。我不仅仅接受天主教会的教导。自从我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以来，我一直在认真思考我的人生意义以及我对死亡的理解。我热爱天主赐给我的生命。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了。但我深知，天主不仅是我生命的创造者，也是我所爱之人的生命以及这美丽奇妙世界的创造者。我渴望见到天主；我渴望看见那位创造这一切的天主。我无法想象祂会比祂所创造的一切逊色，当然，我也希望能在天堂见到所有美好的人，包括你，我（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对你感激不尽。此生短暂，而永恒——它就是永恒。

露丝又过了三个星期才写完那封信，寄出去之前她又加了几页：

我不想显得伤感，但这或许会成为我的告别信。我希望不是，但以防万一，请容许我感谢你深厚的友谊，感谢你鼓励我去了解并热爱文学与文化

的世界。虽然我不太擅长写信，但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为你祈祷。

当然，我希望你能重拾你受洗时的信仰。真的，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呢？根本没有天主？天主存在，但祂从未与我们沟通？天主存在，祂与我们沟通过，但我们不知道是透过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其他人，还是以上所有？最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比前两种要大得多。那么，问题变成了：究竟哪一种伟大的宗教最有可能代表天主与人类的真正沟通？我毫不怀疑，如果你能运用你卓越的智慧来思考这个问题，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天主教会存在除了以下事实之外，别无解释：那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确实死了，祂的尸体确实复活了，他确实四处行走，与那十一位平庸之辈交谈，而正是这十一位门徒，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好了，再次感谢，再见。带着爱与感激。

死亡

九月初，露丝卧床不起，需要吸氧气。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许多人前来为她祈祷，或只是陪伴在她身边。她于1998年9月23日下午去世。那天下午，数十人自发性地前来。那时还没有手机，没有人发信息，他们仿佛「知道」了什么，然后就来了。在她弥留之际，他们守候在她身边。正如主教座堂的神父兼好友所观察到的：

教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围坐在一起祈祷，与她一同祈祷。我相信这给了她力量……其实，如果只是静静地陪伴家人，而不是像除夕夜那样敞开大门，或许会更容易。但让那些人进来，亲眼目睹她虚弱的身影，见证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及她身上所展现的伟大尊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露丝去世时，就像她生前一样，被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围绕着。

Photos courtesy of
www.ruthpakaluk.com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Lu-Si-Pa-Qia-Lu-Ke-Qi-Zi-
Mu-Qin-Peng-You-She-Hui-Yun-Dong-
Zhe/](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Lu-Si-Pa-Qia-Lu-Ke-Qi-Zi-Mu-Qin-Peng-You-She-Hui-Yun-Dong-Zhe/) (2026年3月13日)